

目 录

一、童年	1
二、在东北	6
三、南开学校	11
四、东渡日本	21
五、五四风暴	38
六、赴欧和入党	52
七、青年团旅欧之部	66
八、黄埔军官学校	80
九、从统一广东到北伐	100
十、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115
十一、从四一二到七·一五	127
十二、南昌起义	141
十三、六大前后	159
十四、在中共中央工作	179
十五、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	207
十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241
十七、长征	277
十八、初到陕北	298

十九、西安事变	324
二十、五次谈判	351
二十一、山西抗战	370
二十二、在武汉	393
二十三、东南行	429
二十四、到苏联疗伤	458
二十五、皖南事变前后	468
二十六、坚持在重庆(上)	501
二十七、坚持在重庆(下)	532
二十八、总结历史经验	553
二十九、新形势下的谈判	564
三十、抗战胜利和双十公告	588
三十一、政治协商会议和停战谈判	609
三十二、和谈的破裂	638
三十三、第二条战线	662
三十四、转战陕北	679
三十五、在西柏坡	713
三十六、和平谈判	749
三十七、建国前夕	765
注释	781
后记	833

一、童 年

淮安，是苏北平原上一座古老的城市。它处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的联结点。清朝的漕运总督衙门便设在这里。当铁路兴建以前，淮安是南北交通通常都要经过的地方，也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经济比较繁荣，文化也很发达。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清晨，周恩来便诞生在这座城内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里。

周恩来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说起来很有趣，鲁迅（周树人）大概也是出身在这个家族的。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还提起过这件事：“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①但到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字攀龙）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就离开绍兴，迁到了淮安。

周殿魁为什么要移居淮安？这同绍兴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那时候，绍兴的社会里除劳动者外，中上层中比较多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出路一般是应科举，绍兴人却大批地去当师爷，到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师爷不算是官职，是由主官聘请的幕僚，所以被尊称为老夫子。在县衙门里，刑名师爷管司法，钱粮师爷管财政税收，他们在幕后替

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因为师爷中绍兴人特别多，人们常把他们称为“绍兴师爷”。商人的出路则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周殿魁因为当师爷来到淮安，晚年有很短时间做了淮安府山阳县（一九一四年改名为淮安县）的知县。在他当师爷的时候，同二哥周亥祥合买下了驸马巷这所宅院，从此，就定居在淮安。

周殿魁有四个儿子：贻赓、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贻奎、贻淦。按照封建大家庭的规矩，叔伯兄弟间的排行，分别是四、七、八和十一。劭纲便是周恩来的父亲。周殿魁五十多岁就死了。他生前不事生产，身后只留下一所自己居住的房子，并没有田产。到周恩来父辈时，家庭的经济景况已经相当衰败。

周恩来的母亲姓万，小名冬儿，因为排行十二，大家都叫她万十二姑。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出身，以后在同属淮安府的清河县（一九一三年改名淮阴县）做了三十年知县，就定居清河。万十二姑读过五、六年家塾。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结婚后，生了恩来（字翔宇）和他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恩溥比他小一岁，恩寿比他小六岁。

周恩来幼年时的小名叫大鸾。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父贻淦病危。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特别看重有没有后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人们头脑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贻淦那时结婚还不到一年，没有子女，心里很难过。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他留下的妻子陈氏能有所寄托，周恩来的父母尽管那时只有这一个孩子，还是把他过继给贻淦。两个月后，贻淦去世了。幼年的周恩来由守寡的嗣母陈氏带在身边抚养。

陈氏的娘家在苏北宝应。她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庭，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那时才二十二岁。她因为年轻守寡，从不外出，就把全部感情

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周恩来称陈氏为“娘”，而称自己的生母为“乾妈”。陈氏给他请来一个乳母，是当地人，叫蒋江氏，一起住在西院的两间小屋里。周恩来四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五岁起，送他进私塾读书。嗣母对他的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窗前教他读书。有一次，恩博玩刀子，几乎伤了他的眼睛。于是，陈氏更不许他轻易出去，整天把他关在屋内念书。空暇时，就教他背唐诗，给他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

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异常深刻的。四十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②他又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③他还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一九〇四年，六岁的周恩来随同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居住，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外祖父家里人很多。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他母亲去调解。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经常跟着母亲去，在旁边听着，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万家的藏书很丰富，使他能大量地自由阅读。周恩来从小便喜欢看书，他所读的第一部小说《西游记》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看的。他很聪明，性格中又有着活泼的一面。在外祖父家，同辈的孩子比较多，常在一起玩，使他度过几年比较欢乐的童年生活。

这时家里的经济景况已经越来越不好了。父亲为人老实，胆小，能力比较差，到清江浦后，只谋得一个月薪十六元的小差事。家

里常靠借钱过日子。他的生母又劳累，又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那是一九〇七年上半年的事^④。夏天，嗣母带他到宝应她堂兄家住过两个月，仍回到清江浦。第二年七月间，嗣母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⑤周恩来对陈氏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写过一篇《念娘文》，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对记者说到：“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⑥两个母亲的死，使周恩来周围的生活陡然发生变化。料理完丧事，家里已是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⑦。

周恩来弟兄怎么办？留下的只剩一条路：秋冬之交，他领着比他更幼小的两个弟弟（九岁的恩溥和四岁的恩寿），重新回到淮安那个残破的老家。

回到淮安，等候着他们的是艰难而凄凉的日子。那时，周恩来还只有十岁。可是，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收入都很微薄；叔父贻奎从年轻时起就偏瘫在床；家里有什么事需要人出头的时候，周恩来已算是全家最年长的男子，尽管他年龄还那么小，却没有别人可以代他承当。

周家没有土地，只有那所自己居住的房屋，有一段时间一部分房屋也给抵押出去。要债的人络绎上门。有时伯父寄些钱回来，才还掉一笔帐。借贷无门时，就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但是，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各种礼仪和规矩特别多，即便里边已那么破落，外头的场面还得硬撑着。周恩来后来回忆道：“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⑧墙上贴上一张纸，按照封建家庭的习俗，“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⑨

这副生活的担子，沉重得几乎不是童年的周恩来所能承受得

了的。但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并承担起这一切。他这时还到东门附近表舅龚荫荪的家塾里读书。龚荫荪的思想倾向维新，到过日本，家里除许多古籍外还有一些宣传近代西方文明的新书和报刊，周恩来曾把他称作自己政治上的启蒙老师。龚家的表姐们和他共同学习，在一起做组诗等游戏。只有在这里，他还可以获得一点短暂的欢乐。此外，那两年多的时间里，留给他的只有令人窒息的痛苦的回忆。

可是，在他面前，一时没有第二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这种凄凉的经历，使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对封建家庭和习俗的强烈憎恨。

到他十二岁那年，伯父周贻赓（字曼青）在奉天（今辽宁省）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俸饷科已升任科员^⑩，生活稍稍安定一点。周恩来平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写信同伯父商量。伯父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这个侄儿的才学，也很同情他的处境，就在这时写信要他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生活。

这在周恩来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后来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⑪

二、在 东 北

一九一〇年春天，周恩来随同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来到东北。

远离江淮平原的故乡，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从牢牢地禁锢着人的心灵的封建家庭和私塾生活转到刚刚开办的新式学堂念书。周恩来眼前天地顿时变得广阔多了。

周恩来出生的时候，中国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帝国主义列强恣意地蹂躏中国的土地，凌辱中国的人民，并且扬言要瓜分中国。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到最危险的关头。这是放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的最突出的问题。

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十年前，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时，十五万沙俄军队越过边境，强行占领东北的几乎全部主要城市。他们在江东六十四屯，在海兰泡，制造一起起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战争结束后，他们拒不撤兵，说是要把东北变成他们的“黄俄罗斯”，从而激起了席卷中国各地的拒俄运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和沙俄又以中国的土地——东北作为战场，进行了为时一年七个月的战争，使

东北人民在外国军队的炮火和硝烟下遭受深重的灾难。战争的结果，东北的南部和北部分别成为日本和沙俄的势力范围。这种对中国权益的重大处置，根本没有征得中国方面任何同意。一九一〇年，也就是周恩来来到东北那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东北同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唇齿相依。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

这一切，不能不给少年的周恩来带来异常强烈的刺激。他刚到东北时，奉天府（今辽宁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所以先随三堂伯到铁岭进银岗书院（初级小学）读了半年书。这年秋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建成。伯父把他接到奉天府，插入这所学堂的高等丁班学习。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暑假中，周恩来到他同班同学何履楨的家去作客。那里是沈阳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正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村后的山上留有沙俄立下的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建的塔。当地的老人向他们悲愤地诉说沙俄军队血洗这个村子时的悲惨情景。何履楨的祖父何殿甲带他们到日俄两军曾经激烈争夺过的烟龙山察看，并且写下这样的诗句：“登彼龙山兮山巍，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少年！”^①

富于感情的周恩来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就在这些年头里，他时刻关心国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每天必读。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大声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帐，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②

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连串问题从这个时候起，一直象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周恩来的心中，成为经久持续的动力，推动他不断向前求索。

周恩来在回顾自己青少年的历程时曾说：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从爱国到革命，这几乎是一切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那时的革命还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六两等小学堂里有两位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很富于正义感，在宣统年间就剪去辫子，经常向学生鼓吹反清革命，并且把章太炎的文章和同盟会的刊物拿给学生读，还曾把邹容充满激情地鼓吹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借给周恩来看；另一个地理教员姓毛，倾向改良派，介绍学生看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周恩来在高老师的影响下，热烈地同情革命。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时，他剪去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

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刚开办不久的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十门。它的“新”当然有限得很，但比起旧式的私塾和书院来，这些课程毕竟在周恩来眼前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他在学校中学习认真，有礼貌，守纪律，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国文的成绩尤其突出。课余常爱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籍。他的作文常被教师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国文教员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⑧

一九一二年十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

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他当时认为，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他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励？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校长和教师，他也提出恳切的要求：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靡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④

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文章。

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但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和引人注目的才能。他怀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对教育的目的和师生的责任也作了比较好的阐述。国文教师读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了几句话：“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⑤第二年，奉天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把这篇文章作为甲等作文展出，并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中。一九一五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以后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两书也先

后把这篇作文收入了。

周恩来到东北另一个好处是学会了交朋友。他的性格是温和的，但他对无理的横暴决不低头和退缩。他初去东北时是个比较文弱瘦小的孩子，说话又有着浓厚的南方口音。一些大同学骂他是“小蛮子”，经常打他，欺侮他。经过两个月，他就想法子交朋友，出入时同一批和他一样瘦弱的孩子一起走。这样人多势众，大同学再来欺侮，他们就抵抗和对打，那些大同学也就不敢再欺侮了。

学校里有一个姓吴的老校工，工作很辛苦。周恩来经常起早来到学校，帮助老校工扫地、烧水。有一次这个老校工病倒了，周恩来去看望他，把身上仅有的八个铜元给他，帮助他治病。

到东北，在周恩来身上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把他的身体练习好了。童年时，周恩来的体质是比较弱的。东北气候寒冷，风沙漫天。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一直坚持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他的生活又比较俭朴。经过几年，把他的体格锻炼得很强健。后来，他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过：“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他又说：“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这时的周恩来，同他在苏北的童年时代相比，已有了显著的变化。但更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他到天津进入南开学校以后。

三、南开学校

一九一三年二月，周贻赓的工作有了调动，到天津改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①。十五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一起搬到天津，住在元纬路元吉里几间狭小的平房里。这使他的生活环境又起了巨大变化。

来到天津，展现在周恩来面前的世界更加广阔而多样了。天津历来是华北出海的门户。一八六〇年辟为通商口岸后，这里有英、法、俄、德、日、比、奥、意、美九国的租界。天津又是一个重要的工商城市，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新式教育在全国都居于比较先进的地位。在这里所接触到的大城市的社会生活，所呼吸到的近代社会的空气，是东北难以相比的。

周恩来到天津后，就准备报考南开学校。这是一所闻名国内、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是一九〇四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创办人严修（字范孙）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校长张伯苓原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的。后来因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转而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到日本、欧美考察过。他对办教育是很认真的。

学校在暑假中招生，考试的科目有英文、国文、算学三门。为了准备考试，特别是考虑到南开重视英文的特点，周恩来先在天津

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这是一所单独授课、随到随教的学校。八月十六日，他参加南开学校入学考试。录取后，在八月十九日报到入学，编在一年级己三班（以后改为丁二班）就读。

从这时起，整整四年间周恩来一直在南开学校学习，并且住宿在学校里过集体生活，连假期中也是这样，很少回家。从第二学年开始，他和同学张鸿诰、常策欧等三人，自愿结合，住进新建的西斋三十五号，一起住了两年。后来他提议：我们一块住了两年，友谊很深，但这样下去我们和别人接触太少，应该分开，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张鸿诰和常策欧都表示同意。所以最后一年他同蔡凤等住在一起。周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多年远离故乡，思念亲人，常使他感到十分痛苦。他在作文中不时流露出这种浓烈的思念之情：“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②除夕之夜，同学们大多回家，他的这种感情一时就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③因此，他对学校和周围的同学就格外依恋，“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④。

从十五岁到十九岁这个年龄，正是对一个年轻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时期。因此，南开学校的教育对周恩来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从当时来说，南开学校的教育是比较进步的，并且很有特色。

第一，学习也好，生活管理也好，要求都十分严格。南开学校的学制是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都有十小时。次科有物理、化学、中国史地、西洋史地、生物、法制、体操等。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课都用英文课本。为了提高学生英语

会话的能力，还请了美国老师来教课。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学校还到日本购买了大批实验设备，让学生自己动手去做，这在民国初年的学校中是不多的。各门课程每月考试一次，期末有大考，留级和淘汰的都不少。能坚持到毕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全校在每星期三下午有一次“修身”课，由张伯苓和其他教师讲国内外大事和做人做事之道，有时也请校外的名流学者来校讲演。学校中的纪律十分严格。学生外表必须整洁，举止必须有礼貌，放荡的生活是不容许的。

第二，学校积极提倡学生开展课外活动，要求学生在学校里不单是读书，而且要学会办事，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学生里有许多社团和学术研究会，这都是受到学校鼓励的。学校还经常组织各门学科的班级间或个人间的比赛。校内出版《南开星期报》，后来改名《校风》周刊，由学校提供经费，让学生自己编辑出版，通常以全校国文比赛第一名的获得者担任主编。南开的新剧团也很有名。它成立于一九〇九年，最早上演的新剧《用非所学》是由校长张伯苓编剧并导演的。假期中，学校还为留校学生安排了各种活动。

因此，这所学校和当时许多死气沉沉的或放任散漫的学校不同，很有一些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周恩来的同班同学陈彭琯（来博）在回忆中说：周恩来在学校里“给他的印象，概括成四个字：严肃活泼。在学时办事认真严肃；平时爱活动，很活泼，很有风趣”。^⑤这些显然同当时南开学校的校风也有一定关系。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很优秀，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南开学校对国文十分重视。每两个星期做一次作文。周恩来文思敏捷，作文不打草稿，提笔直书，一气呵成。学校组织一年一度的作文比赛，获得第一名的被同学看得象“状元及第”一样，是莫大的荣耀。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学校里组织了一次

選詞基念惟用筆精平

則之志勤能補輯古人語不我與學久不忘矣賢正在吾輩韓文
公以勤勉後追古先賢以情戒人間映璽讀書畫地識字其勤為
何如其成功為何等耶彼勤也者以之驗於人以之驗於事非勤
鑄以致其功非勤無舉其事於食終日無所用事固可謂勤矣吾人可不奉
為金科玉律懸以為座右之鏡而履勤而不怠之執事求其生平則萬
計大至於國小至於生身殆無不受其賜然則勤之可謂勤矣

一生之計在於勤，論

丁二班周恩來

欲等一生之計，全求學其無從。然學而不教，則又何貴乎？

故人之計定矣

人、家、一、生、求、學、爲、育、年、最、大、之、時、則、基、礎、立、於、頭、腦、達、身、心、而、成、才。

勤撻扶灌滋之安能得良好之結果哉及乎畏也惟有杜會庸

國之頗以爲底旌之爲天雖方能以其所傳

卷之三

子所患也。則知其所以患之，則可也。

如其生平之
所為，一
無成績。
功名一
生計亦
甚良得，
而為眾為國
所盡，非
所遺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在一生以下我是如視影這樣存着陰之間翹起舞無之

卷之三

周恩来作文手迹